

死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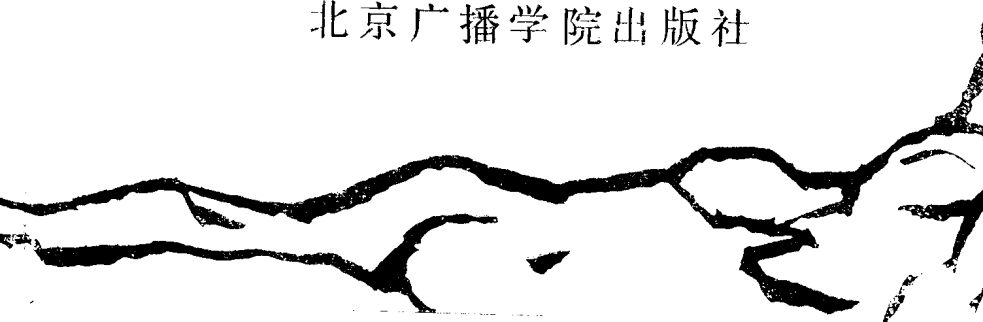
安峰 著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死角

安 峰 著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死 角
安 峰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枫叶印刷厂印刷

ISBN 7-81004-161-4/I14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 11 字数: 240千

1989年10月第1版 1989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7.950册 定价: 4.95元

序

戴战军

那时我借以栖身的出版社，和安峰所供职的报社还合并在一起，我们时常碰面，却不打招呼——因为我由大学毕业初来乍到。另外，数遍两社风流人物，无论如何也点不到他老安的名字，说他太“一般化”了，才学也好，气质也好，甚或所谓“实绩”，俱是不显山不露水的。

他属于“默默吮咪”的那一类。由于没甚资本可言，便只好下苦功夫，从基层企业单位一步一步熬上来，在报社里一个不起眼儿的部门当今不起眼儿的小编辑。

后来，有人在饭堂热情而又兴头十足地指给我：那人叫安峰，听说采录的时候出了事儿！

照传闻，这“事儿”足以引起大多炎黄子孙的巨大好奇。我认识了他，并暗藏着一种“咯吱咯吱”的心态从旁悄悄地窥伺，仿佛想从他眉尖眼角寻到些那“事儿”的生理和心理佐证。我发现他是一潭深水，柔寂而沉郁，蓄而不发，不苟言笑，悄悄地，淡淡地，几近惹人怜。他的全部好象被“寡默”这个词实行了一元化领导，或么是身旁总睡着一

头狮子，害怕惊醒它似的。

于是我便想：果真人不可貌相，皮囊下裹着的心是永难揣度的。

七八年下来，咱自己也经历了不少“事儿”，不是这事儿便是那事儿，这才深知人言可畏，世事险恶，才明白“你不找事儿事儿找你”的规律。进而得出这样的结论：咱们吃文化这碗饭的，除了舞文弄墨这块稍清静些的“自留地”外，恐怕再没什么惹不出“事儿”的事儿可干了。

于是便一头扎到了书桌上，于是便在感慨之余偶然想起安峰，把在为人处世上郁郁寡欢的他和后来在创作上收获颇丰的他两相对照，细细琢磨，仿佛悟出他在个人事业发展上的最初的原动力。

不管我揣摩是否准确，事实是老安依然黑着脸“溜边儿”，并且不断悄没声地写出一篇篇越来越有分量的报告文学作品。如此我便有了这种感觉：“他把那个被压抑或者是被掩藏起来的富于激情的‘我’，全发泄到他的文章里去了，似乎现实中的他越寂寞，文学里的他便越活泼。”

如今，安峰已被提拔为报社某个部门的副主任，且所著报告文学即将结集出版了；而曾经津津乐道于“出事儿”的人后来又现身说法，翻舌鼓唇粪污别的人，且迄今并无甘于寂寞的意思，自然，其人也拿不出两页可以证明无愧于自己那份工作的最起码的文字来。

生活这个法官很公正：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其实，我对安峰了解并不很多，作品之外的事情，大都源于道听途说而来的只言片语，或是我们巧遇时的仓促观察，因此，倘若要辨析安峰其人，以上不足为训。我只不过是囿于由来已久的“人品”与“文品”的窠臼，谈一点人所

共知却又为许多人不以为然的道理而已。但愿那些有志于文学或是别的什么事业的人，能够由此得到些启发。

诚哉斯言：别人对你的品评只属于别人，唯有本事才属于自己。

我和安峰的交谊，多是靠各自的作品，由于都知道“忙里偷闲”为文的甘苦，所以不约而同地尊重对方。

近些年来，报告文学越来越吃香，这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人们更讲究实际，认为“真人真事”的报告文学最接近现实生活；二是人们的参与意识增强了，想通过最富于“活标本”意义的报告文学，更直接地分析认识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和社会。可以预言，在注重“立竿见影”这样一种社会心态的驱动下，报告文学独受青睐的现象，将和种种“短期行为”一样，继续存在相当一段长的时间。这也注定了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它的“报告性”总是凌驾于“文学性”之上。如今市场的需求更强烈地制约着精神产品的生产，人们读报告文学的目的，更多的不是想接受“文学的熏陶”，而是介入被表现对象本身。

从报告文学的特质和社会标准来观照安峰的作品，我们不仅可以肯定他已比较熟练地掌握了报告文学这一文学样式，而且可以肯定他是一位富守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的作者。

就我所知，收入这本集子中的作品，创作时间上的跨度大约是十年，刚好和“十年改革”同步。在这十年里，中国改革开放这一主旋律，演出了曲曲折折的快板、慢板，三拍、四拍……政策的不断调整和修补，社会意识的聚合与分裂，观念上的南辕北辙，宣传上的春夏秋冬——所有这些，对国民的心态产生了巨大冲击，给每个人的精神世界打下了或深或

浅的烙印。安峰的作品，有意无意地为这段独特的历史充当了见证。他不仅忠实纪录了富于社会典型意义的事件，勾勒出具有时代特征的人物肖像，难能可贵的是，他以一种为民请命的勇气和对社会负责的精神，大胆揭露了在改革的洪流中独占一方的腐败黑暗的“死角”，无情抨击了沉渣泛起的丑恶和假改革之名营私舞弊的种种卑劣行径，以触目惊心的事实和振聋发聩的疾呼告诉人们：中国的出路在于改革，而改革的路上有重重艰难险阻，要想赢得成功，就必须经得起痛苦，经得起牺牲，经得起时间的持久考验。

我有时也觉奇怪，不知道这个少言寡语、焉焉乎乎的安峰，如何写出了那些疾恶如仇、锋芒犀利的文字？看来“文若其人”，也不尽然。

尽管安峰的文字尚待锤炼，尽管他在艺术手段上还不很丰富，尽管他的作品在深度上仍需开掘下去，但我认为，仅是他笔锋下的那个“敢”字，也足以使人为他鼓掌了。

正是出于这一原因，当老安请我为他的报告文学集“作序”时，我稍事推辞后便“尊敬不如从命”了。

就初涉文苑的我来说，实难为他的著作增色，自知笔力不济，只好谈点印象和皮毛。而安峰的文采和胆识，相信读者会从他的作品中学览无遗的。

1989年3月7日于地安门乐春坊

目 录

序	戴战军(1)
“死 角”	(1)
哀中华	(33)
——一位旅日华侨的奇特经历	
裹着阳光的罪恶	(63)
鞭痕累累：一个改革者的勋章	(80)
新星的轨迹	(113)
——记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王凤林	
女儿风流	(134)
——在京保姆二三事	
千斤顶	(151)
荒原上的脚印	(179)
护寒红枫耀眼明	(203)
故宫里的怪人	(225)
人的价值	(242)
在羁绊中开拓	(263)
钨的性格	(277)

——发生在老座山脚下的故事

善走险棋·····(296)

一个强音符·····(312)

后 记·····(339)

“死 角”

贫穷、愚昧、欺诈、男盗、女娼、诱惑、凶狠、哀嚎、报复……改革挤进了这个死角，付出了怎样的艰辛！

——摘自采访日记

哀 怨

墨蓝的天空上挂着月亮的半个黄脸儿，整个六安市都在夜色中沉默。

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人急急地敲着市委王副书记的门：

“叔叔，叔叔！快开门！婶婶，快开门呀！”

小伙子进门就哭。

原来，他给工厂买齐了机器零件，告别叔婶要回厂了，傍晚上车时偏偏丢了车票，又不好意思再回叔叔家。正在踌躇，过来一个五十开外的妇女，献媚地问道：“孩子，住店吧？房子很好，一宿才收五角钱。”他想，住店这么便宜，便跟老人走了。进了屋，老人却怎么也不离开了。青年人洗了脚，对老人说：“我该睡了。”那老人说：“你要冷被窝

热被窝？”他问：“什么叫冷被窝热被窝？”老人道：“热被窝就是我在被窝里陪你睡。”小青年听到这儿，知道这是暗娼窝。看一眼这老年女人那满脸的皱纹，顿时浑身起鸡皮疙瘩，拎起包，拔腿往外走。老人上前抓住包，朝他的脸“叭”地就是一个耳光，同时喊道：“打你这个小流氓，我都这么大岁数了，还要来调戏我，打流氓！”

此时便是有理也说不清了。小青年丢下包，拔腿就跑……

婶婶听完后，便给正在军分区开会的爱人王副书记挂了电话。王副书记赶到家，听罢事由，紧锁着眉头对爱人说：

“这种事，只好去找郑敏同志了。只有她有办法解决。”

郑敏，六安市第一水运公司职工子弟中学的先进教师，四十出头，嘴唇薄薄的，能说，得理不让人。

第二天上午，郑敏带着市委王副书记的爱人和他们的侄子，径直来到长途汽车站，远远便看到那老妇人正在车站“接客”。

郑敏不容分说，把老妇人拉回家，开门见山指着小青年对她说：“老嫂子，这小鬼是外地人，不懂得这儿的规矩，冒犯了你，就担待点把包还给他吧。他在工厂当采购员，第一次出差，别难为他了。”

那老妇人无地自容地“扑通”一声跪在郑敏面前哭了起来。自己抽打着嘴巴，口中喃喃道：“我不要脸……”郑敏连忙扶起她，问道：“咋回事？”老妇人泪眼汪汪地叙说，老伴得了急性阑尾炎，不交五十元现金医院不开刀，到自己单位找五六趟，人家分文不借。眼下只有卖身这一条道能救老伴了！老妇人悲恸地哭道：“谁愿意舍脸搭暗棚干这个呀！”直说得郑敏和老大姐掩面拭泪。

当小青年拎起包向车站走去的时候，郑敏望着河边那一

贫困的“暗棚”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老大姐深知内情，也无可奈何地摇摇头。

难怪这些善良的女人叹息。卖淫，在这片贫民窟是公开的。比如郑敏的学生们，天真烂漫，活泼可爱，女孩一个个长得水灵灵的。可是刚满十七八，生活所迫，便就往“暗棚”这条道上走了，怎不叫人揪心？郑敏问过她的学生：“干什么不成？非要干这么下贱的事？”学生苦着脸，却扬着眉说：

“不干这个，有啥干的？不干这个，吃啥？”最初，公安局也曾试图打击一下，最先从“暗棚”抓出来的是个不足四十的媳妇。她进了派出所便长舒了一口气：“这下不用干活也能吃上饭了，我家病重的爱人和几个孩子得归你们养活啰，眼不见心不烦啦！”总不能让她们断了生活，结果，没关一天就放了。那媳妇脚还没走出派出所的门，就说：“我出去还得干这活，你们要是不让，就给我找个别的活。”往外走两步，又回过头来，挑衅地说：“水运公司的女人干这活的多，你们要不让干，给我找工作啊！就怕你们没这本事。”

干这种活，只凭女人的本能，用不着在知识和技术上给予什么投资，钱挣得方便，所以六安水运公司有的贫困的女人认准了这条道。“穷”字把耻辱撵跑了，新媳妇在只用几根麻杆隔开的另一间屋里干这种活的时候，隔壁的公婆听得喜滋滋的，他们为儿媳一进门就挣钱而满足。那么，男子汉们呢？有本事的，搞点别的营生，为数不算太多，因为凡搞营生总需本钱。这，他们没有。所以，他们终日泡在车站，眼瞄着过往客人身上的钱包，盯准了就下手。这虽冒风险，钱却来得容易。好在进了公安局，就可以坐享“八大两”了，这样的风险也实在可爱。还有些船民，专在家里设赌，伺候运输队长、经理、会计们进门赌博，以期从这种领

导者的赌金中抽得一点彩头。“男盗女娼”绝不是一句虚话，在六安这个角落里，是铁的事实。

最可怜的该算是水运公司造船厂邵文友两口一对瞎子。年轻力壮眼睛亮的尚且从娼为盗，瞎子的出路何在？求情托人，到医院去卖血。邵文友卖了二百三十毫升，回来就躺在床上病倒了。爱人仇恒红无钱给他治病，就拄着棍子摸进医院再卖血，谁知医务人员嫌她太脏，不收。瞎子哭着哀求：

“你们查了，我的血不是合格吗？我人脏血不脏啊！”到底没卖成。后来造船厂的书记找上门来了：“我侄子要输血，我可以照顾你们。”完全是一副救世主的腔调。邵文友说自己身子薄，最多只能卖三百毫升，要不身子挺不住。书记把他拉进医院，却抽去了四百二十毫升，邵文友回家躺在床上动不了，蜡黄的脸象死人一样。老伴左一趟右一趟，磨破鞋底到书记家去要血钱，书记总是没好气道：“急什么？你们就等这几个钱用不成？”

实在没路了，老两口回忆起解放初的一句歌词：“共产党一心为人民。”邵文友觉得该找共产党讲讲心理话了。他拄杖去寻找市里主要负责人。在偌大个六安市寻找市委主要领导，对于一个瞎子来说不等于是大海捞针吗？当西斜的太阳收尽它最后一道光束的时候，一个绝对不愿提供姓名的男子汉，领他来到市主要领导同志的家门口之后，悄悄地走了。敲门，半晌才从里面冲出一句话：“等着，我们正在吃饭。”邵文友筋疲力尽地瘫倒在市领导的家门口。一口饭还没吃呢，也该缓缓劲了。屋里人大约酒足饭饱，这才开了门。邵文友两句话没说完，被一位中年妇女打断了：“市委领导又不是为你一个人办事的，这么点小事也值得找到这儿来？”那领导也慢悠悠地剔着牙，半晌才从牙缝挤出一句

话：“有什么问题，找你们单位的党组织。”邵文友跑了一天，只得了这么一句话。可怜他只好一步三晃地摸到家。第二天，他又去找信访办公室。市信访办公室回答得很明确：“共产党在哪儿？去找你们单位的书记，他会告诉你。”

邵文友回到单位找书记。书记道：“我在这儿，你还找什么共产党？告诉你了，现在是各人顾各人！”

“各人顾各人”？这叫什么话？邵文友不服气，打算拄着棍子一路要饭到北京，去问一下共产党对我们瞎子该怎么办。

公路上，汽车卷起阵阵烟尘。郑敏认出了烟尘中的邵文友，赶过去，塞给他十元钱，劝道：“您回家吧，北京，我会替您去的。”邵文友使劲地握着郑敏的手说道：“不能老让你这么补助我呀，我要上北京去告他们，让共产党知道下面有的当官的个人盖高楼，私人买汽车，就是不管老百姓的死活。”郑敏说：“请您相信我，我会上北京表达您的意思的。”

为了船民们的出路，六安水运的问题她早就向上面反映了。她找了市委找地委，领导干部们众口一词：“没办法，老大难。”六安水运只靠淠河。淠河一年只有半年通航，通了航也货源不足。除了河，根本没有给船民们提供别的工作的可能。就是维持现状，六安水运每年要吃掉国家几十万贷款和救济呢！“没办法。”六安市坐办公室的人，大多都这么说。

挣 扎

天下会有“没办法”的事？怎么说，郑敏也不信。万里

同志来六安市视察工作时，她以教育行业的先进工作者身份，带着几名教师，反映水运一公司孩子家长们的强烈呼吁，要求治一治贪官污吏，给船民们一条出路。

郑敏的声调是凄厉的：“船民在卖淫、在卖血，船民子弟不少在偷盗，他们实在没别的办法混饭吃。可水运公司的领导干部们，有钱买汽车、盖楼房、买拖拉机，随意挥霍船民们的血汗钱。这种残酷的剥削，上面应当管一管……”

不光用嘴反映情况，她还呈上一份书面材料，为改变现状，她大胆提出了六安水运一公司的改革措施！

不久，安徽省两位省长亲自批文至六安市交通局，建议六安水运公司起用郑敏。

终于，一个偶然的时机，郑敏在六安水运一公司第八大队当了工会主席。大队长余志本是个老粗，对郑敏说道：“郑老师，往后外出唱花脸的事，我去。你识文断字，在家给我掌舵。”

这舵能交给郑敏来掌？全大队没一个相信。

1983年初夏，淠河刚刚放水，船民们的脸上荡漾着希望。几个船民擦着脸上的热汗在岸边歇息，对前来了解安全生产的郑敏说：“这么多月没领到工资了，就指望开船呢。”郑敏道：“是啊，一开船，咱们都有工资了。”郑敏一说这话，再没人言语了。船民们叨着旱烟，眉头皱得紧紧的。郑敏好生奇怪。

半晌，其中一个船民说：“你们当干部的可不受开航的限制，哪个月少领了工资？”

郑敏瞪大了眼睛，一脸问号地说：“怎么？干部应当跟船民同甘共苦，你们没工资，干部怎会领呢？”

“郑老师快别说了，您每月都领了工资，还以为我们不

知道？前几天还看见会计的工资表有您的签名呢！”

“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郑敏一脸惊叹号。

“不可能？”船民们脸上流动着不屑一辩的神色。“别说是干部，连干部家属也领工资呢，看看会计的帐，余志本的老婆、儿子领工资了没？”

郑敏脸上的问号、惊叹号全没了，说了句：“我看看帐再说。”抬腿就奔向会计室。

会计哪里肯把帐拿出来。郑敏瞪着眼说：“我是工会主席，而且是财经纪律检查小组的副组长，你难道不知道吗？”会计只好拿出一本给她看。

原来，船民们反映的全是真的，不但余志本、会计、出纳、队长等干部月月领了工资，就连余志本的老婆和他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也每月巧立名目领着固定工资。郑敏的几个月工资竟分别被他们冒领了！那工资表上还有些根本没拿到工资的船民的名字。可怜船民中许多人斗大的字不认一个，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你说没领，会计指帐本上的名字说你领了，这个理到那里去说？在漯河上行船的人，大多数都习惯了逆来顺受。这些船民们既善良又愚昧，这种善良、愚昧束缚了他们本来就迟钝的思想和笨拙的手脚，迫使他们在贫困与苦难中挣扎。

漯河通航期短，货源不足。怎么一个个当书记、队长、会计的大大小小的干部家里都肥得流油呢？原来他们利用了船民的善良、愚昧与软弱，贪婪地吸着贫苦船民的血！

法律分野上的是与非有时仅一纸之隔，软弱的船民只知在苦难中挣扎求生，却很少去想一想那是与非。

郑敏站在余志本面前，捅破了这层纸。余志本“叭”地一拍桌子：“领了，又怎么样？有本事你去告我！”

郑敏说：“你说的可是真话？要去告你，你不后悔吗？”十足的老师味。她以为罪恶是怕阳光的。

“有胆子你去告哇，告不倒我，我要你好看！”

是做做思想工作，让他改邪归正，还是告发？郑敏一时没有拿定主意。

可别小瞧了余志本，他身后有着无形的靠山。六安市谁不知水运公司是家族党？党、政、财、文，各种权力均被一、二个家族所垄断。否则，怎么胆敢无异于抢掠地公开剥削船民？告，船民们并不是没有试过，却从未得逞甜头，以卵击石，实在不如忍气吞声。郑敏有多大本事敢碰这块石头呢？就因为没有人敢碰这块硬石头，所以这水运公司就是个山高皇帝远的独立王国。

一个只有三千来人的水运公司，船民的贫民窟里竟设着十几个赌摊。书记神气十足地摆弄着手中的麻将牌，腿上坐个一身风骚、满脸媚笑的女人。灯红、酒绿、恭维、浪笑。个别党员干部，在最贫困的地方，过得真是舒服极了。倒是经理不如书记自在，经常会有人来找。这不，一个老船工，怯怯地站在牌桌旁边，大约等得时间太长，又加上肚子缺食，站得双腿发酸，有点支持不住了。便大着胆子，颤声地说道：“经理，经理，行行好，借给我十块钱吧。”经理认真地看着手中的牌，他当然没有听见，或者是根本腾不出功夫来搭理老船工的哀求。老船工只好提高一点声音：“我儿子发高烧，可我买不起药，公司借给我十块钱，等于救了我一家人的命……”经理的眼光从牌上移到老船工的身上，上下打量了两遍，一皱眉，眼里便冒了火：“出去！出去！没看见我在干什么？……”

水运公司的一些党员干部们当然从未关心过什么叫“腐